

抗战时期职业教育及对我国职教工作的启示

孙玉芹

(河北大学 马列部,河北 保定 071002)

[摘要] 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在职教领域锐意兴革,如增设国立职业学校,添办技艺专科学校,创设初级实用职校,增加中等技术科,举办各类短期职训班,推进建教合作,改进教学实习,分区辅导职业学校等等,中国的职业教育非但没有因战事而荒厥,反而在数量和质量方面均获较大发展。

[关键词] 抗战时期;职业教育;历史启示

[中图分类号] K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477(2011)03-0057-05

中国的职业教育素以沿海沿江地区最为发达。然抗战军兴,上述区域中的若干城市相继陷于敌手。受战事打击,1937学年度,全国职校由原来的494所骤降到292所,学生由原来的56,822人跌至31,592人,教职员由原来的8645人减至4844人。^{[1] (p691,693)} 各项指标跌幅均超出40%。1938学年度,职业学校和教职员数目继续下滑。职业教育能否起死回生,不仅关乎战时社会秩序的稳定,民众基本生活的维持,甚至会影响到抗战的前途。对于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课题,学术界虽有一些研究,但总体来看,以往的成果还显得比较粗糙,不少内容没有展开,多项重大措施未有涉及,故难以充分展现战时国民政府教育部的职教成就。有鉴于此,笔者以详实的一手文献,全面梳理了国民政府教育部及其他相关部门在职业教育方面的改革举措,并就职教改革的实效及历史启迪深入剖析,期能补助是项领域研究之不足。

抗战爆发以后,国民党政府遵循“抗战”、“建国”同时并举之基本方针,对职业教育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俾其既能切合战时特殊的情势,又可与建国奠基之根本之图相应。

(一) 增设国立职业学校并创办技艺专科学校

中国的中等学校,向以省或直辖市办为原则,故在战前,此类学校以省办者居多,间有私立、县立、市立,或联立者,国立者甚少。如职业学校,战前只有同济大学高级工业职业学校、国立北平第一助产学校、国立高级助产职业学校、国立中央高级护士职业学校、国立高级助产职业学校、国立北平高级助产职业学校,以及开办未久之中央工业职业学校。迨战事发生,原办中等学校近半被毁,大批员生流转后方。为谋救济并适应新需,自1937年底起,教育部先后在后方安全地区设立了数十所国立中等学校,从而打破了由省市教育厅局主管中等教育的旧体制。就职教设施而言,1939年在重庆创立国立四川造纸印刷科职业学校,1942年在云都创立国立江西造纸印刷科职业学校。1943年在合川创立国立四川水产职业学校,在北碚创立国立歌剧院学校。同年4月,于昆明筹设国立西南中山中学。后者系由国立华侨中学呈贡分校,及同济大学附设高级工业职业学校留滇部分合并而成。成立之初,分中学、

职业两部,职业部有机械科、土木科各3班,中等机械技术科一、二年级各2班。后奉部令,中学部停止招生,职业部添办纺织、航空机械科各1班。1945年,该校更名为国立西南中山高级工业职业学校。抗战胜利前,又在重庆设立国立高级机械职业学校、国立高级农业职业学校,和国立商业职业学校。^{[2] (p42); [3] (p1039-1041,1043)}

与此同时,教育部复在宁夏、青海、四川、西康、甘肃等省特设8所边疆职业学校。国立宁夏实用职业学校,设省城,前身为宁夏省立初级实用职业学校,1940年1月筹设成立,翌年1月由教育部接办;国立青海初级实用职业学校,设顺德,1940年5月筹办,12月正式成立;国立松潘、拉卜楞(甘肃)两初级实用职业学校,原由中央组织部办理,1941年1月由教育部接办,改为国立;西康初级实用职业学校,1941年9月,由国立西康学生营(收容战区学生)改组而成,校址荣经;国立金江初级实用职业学校,1941年10月设于西康会理;国立清溪职业学校,1943年2月设置于四川犍为;国立拉卜楞寺青年喇嘛职业学校,1945年4月设于夏河。^{[3] (p1233-1234)}

边疆职业学校大部分属于初级。科系设置,视边疆环境需要而定,以农垦、畜牧、畜产制造等科居多。学制方面,一般初级职校3年,边地职校延长1年,俾与内地毕业生程度相当。边疆职教另一特色,由于边地高小毕业生为数甚少,招收合格生源相当困难,故各校多设预备班级,招收及龄儿童,先予一、二年之补习,迨其程度与高小毕业相当时,再编入正式班级。^{[3] (p1222); [4] (p95)} 此种办法,实属艺徒制之改进,为边地职校特有之举措。

此外,尚有国立专科以上学校附设之职业学校13所。三项相加,截至1944年第一学期,全国共有28所国立中等职业学校,101班,学生5087人。所有在校学生80%以上由政府供给膳食,特别贫苦学生并分别发给制服及书籍零用等费。^{[1] (p308)}

专科职业教育方面,1939年,教育部在四川乐至创立中央技艺专科学校,设造纸、农产制造、皮革、纺织染、蚕丝,及化学工程科。翌年在西昌设国立西康技艺专科学校,设农林(分农垦、森林、蚕丝三组)、畜牧、土木工程、矿冶工程、机械工程、化学工程等科。1941年在南京设立国立音乐院。1943年又于南京设立东方语文专科学校,开泰语、越南语、缅甸语、印度语、马来语、

[收稿日期] 2011-06-25

[基金项目] 2010年度河北省社会发展研究课题(课题编号:201003051)

[作者简介] 孙玉芹(1972-),女,河北遵化人,副教授,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民国军事及教育。

韩语等6科。^{[3] (p1036-1037)}

(二)创办初级实用职校,推进后方诸省农工职业教育

抗战以还,人民日用资源匮乏,价格飞涨,生活维艰。为谋养成实用技术人员,以解决一县人民衣食住行之需要起见,1938年7月,教育部出台《创设各县市初级实用职业学校实施办法》,要求各省教育厅会同建设民政两厅,调查各县市主要农业及日常生活必需品之产销与供求实况,分类编制统计,呈送教育部。根据前项调查了解,择取一地生活最感切要而缺乏之职业,分别缓急,决定办校地点与设置科目。学校之设置,原则上要与生产机关合作办理,倘某项职业尚无具规模之生产机关,则应与当地从事该业者联络办理。1937年度内先就桂、黔、甘三省各筹设一校。^{[4] (p144)}一切开支及第一年经常费均由教育部担负,第二年交省府办理。^{[5] (p221)}1939年复在川、滇、赣、黔、康、宁、陕等省拨款筹设。^{[6] (p225)}抗战期间,是种职校大约创办了20所,设置科目大率为造纸、染织、金工、木工、土木、制糖、酿造、制茶、麻织、农产制造、园艺等项。^{[3] (p1048)}

为加强后方生产力量,1939年初,教育部又出台了推进陕、甘、宁、青、川、康、云、桂、黔9省农工职业教育计划。其原则如下:(1)划9省为西北、川康及西南三区,每区设立国立农工学院各1所以上,协同中央农业实验所及中央工业试验所,负各该区内农工教育技术方面推进指导之责;(2)每区各省应参照省内农工职业及原料分布情形决定设置农工各科职校地点及科别;(3)职校之设置,必要时可先成立工厂或农场,视需要训练少数艺徒,逐渐扩充为学校或训练所;(4)职校教学实习改进事项,应由教育厅会同区内农工学院、农工实验所及改进机关规划指导;(5)各区经济与建设机关,应就可能范围内,依照地方需要筹办各种小型工厂或农场与所在地职校密切合作,并可就工厂农场内招收艺徒加以训练;(6)各区内农工建设合作事项,应由农工学院院长联合各省教育建设厅厅长及主管科长、农工实验所及改进机关主任委员负责推进。教育部复颁发每区各省应行添设及调整农工职业学校纲要,分令各省教育厅及各大学院校,根据设施原则并参酌地方情形,分别拟具实施办法,限期呈报核定,以利推行。^{[1] (p662-663)}此项分区推进方案,要求3年内完成,并由教育部酌予经费补助。^{[4] (p161-162);[5] (p29)}

(三)增加中等技术科,宽植紧缺技术人才

为了满足经济国防建设对机械电机技术人才的急切需求,1940年秋,教育部指定中央工业专科学校、同济大学附设之高工、湖南省立第一职业学校、福建省立福州高工、四川省立成都高工、江西省立工专、贵州省立安顺初级职业学校、私立中华,及私立大公等9所师资设备完整办理著有成效之职校开办中等机械电机技术科。后以人事环境关系,委办单位略作调整。如同济高工由国立西南中山高级工业职业学校替代;安顺初职由国立贵州大学接办,改为附设工业职业学校;增加西安私立西北高级机械科职业学校。以上招收初中男性毕业生,年在16-20岁,身体健康,品性纯正。1940年办理20班,计1000人。以后每年赓续招生,规模如前。此等学生一切学杂制服工农书籍医药等费皆免,并酌予津贴及生产奖金,其待遇较短期训练班为优。1943年秋,第一届学生在校训练期满,由交通部、经济部、资源委员会、航空委员会、兵工署等分发各附属单位实习(1年),并由教育部拨给旅费。^{[3] (p1044-1045);[7]}

1943年,又指定国立复旦大学附设之高级职业学校(初在四川北碚,后以校舍困难改由綦江导淮委员会附设之高级水利科职业学校办理)、河南国立黄河流域水利工程专科学校职业部、陕西省立三原工业职业学校,及南充私立育才高级职业学校4家单位增办中等水利科,第一年8班,第二年16班,第三年起每年24班。1946年暑期,首届学生训练期满,由水利委员会分发实习,“成绩尚称良好”。^{[3] (p1046-1047)}

1944年,复通令各省市教育厅局,就原有职业学校增班,或指定优良公私立学校办理农工医各科职业班,计划第一年100班,第二年增加140班,第三年再增加140班。^{[3] (p1047);[4] (p69)}

次于上述中等技术人员训练者为技工训练。1939年冬,蒋介石召集有关机关详议训练技工办法,决定5年内训练技工7000名,由国防工业委员会筹设技工训练处主持其事。翌年9月开始筹备,10月正式成立。旋改隶经济部。技工训练分特别、普通、速成三种。训练期依序为3年、2年和1年。招收16-20岁之男性,体格强健高小毕业,并经考试及格。训练期除衣食住外,每月酌予津贴。自1940年1月至1941年4月,计有兵工署第十一、二十、二十一、二十四、二十五、四十一、四十三、五十、五十二、五十三兵工厂,暨兵工署资源委员会钢铁厂迁建委员会、钢铁厂迁建委员会、中央机器厂、中央电工器材厂、中央无线电器材厂、桂林机厂、全州机厂、中央大学、中央工业专科学校、广西纺织厂、大公铁工厂、祁阳新中工程公司、顺昌铁工厂、民生机器厂、中国兴业公司钢铁部、优顺机器厂等26家单位开班训练,共计招收3411人,内特种988人,普通1951人,速成472人。^{[3] (p1051-1052)}

以上皆属中等教育范畴。至高等教育方面,教育部曾指定多所大学设置各项专修科,如西南联大之电讯、金大之汽车、云大之采矿、武大之机械、川大之化验,西北农学院及中央政校之农业经济,中大之畜牧兽医,中央政校及光华大学之会计,重庆与复旦大学之统计,贵阳医学院之卫生工程与行政。以上为2年制高级职业教育。^{[6] (p226)}1940年夏,复指定中央大学、交通大学、西南联大、武汉大学、同济大学、中山大学、广西大学、湖南大学、西北工学院、金陵大学、重庆大学、英士大学、浙江大学等国立及少数私立大学之工学院添办机械及电机工程师班,共千余名。以后持续招生。招收高级中学毕业生,予以四年训练,再入工厂见习一年。一切费用,均由政府供给,将来工作,亦由公家指派。^[7]

(四)举办各类短期职训班以应亟需

自1938年8月起,教育部指定公私立优良职业学校,依其原有设备人才,办理各种短期职业训练班。1938年举办汽车驾驶修理、电讯、机械等科训练班8个,计学生百七十人。翌年9月训练期满,各方纷纷预约学生前往服务。政府以是项短期训练颇显成效,而社会需要方殷,决计筹措巨款以谋扩充。1939年,教育部一面通飭各省市教育厅转令有特殊劳作设备之公私立职业学校、乡村师范学校,及中学师范,一律设置同性质之各种职业训练班,一面由教育部在救济费项下拨款30余万元,指定各科职业学校,办理机械、电机、电信、土木、测量、应化、棉织、毛织、农产制造、印刷、蚕桑、会计、调剂、助产、护士等各业训练班35个,学生千数百人。1940年举办之班级有学生872人,计蚕桑、畜牧两级80,制糖、制革、毛织、染织、汽车修理、印刷、教具仪器、电焊等435,会计及合作指导等175,护士、助

产、药剂等183。1941年秋,计划招收1000名,训练科目除原办农工商医各种类外,拟增办工业管理、事务管理等科,以应社会需要。以后从未间断,迄抗战胜利,始逐渐结束。此类短训班,以招收战区学生为原则,程度初中毕业,费用全由公家供给,训练期限1年。^{[3] (p1051); [4] (p144; 162-163; p197); [6] (p224)}

(五) 加强建教合作,改进教学实习

早在1936年,教育部就制定了职业学校与建设机关协作大纲,通令各学校与校外生产实习机关,详定分派学生实习方法,并指导考核实习成绩。同年又颁布职业学校设置顾问委员会办法,令各校聘请与学校同性质的农工商医各界专家或领袖5-7人组织委员会,商讨关于学生之服务道德、精神训练、教材选择、实习指导,及就业等事项。^{[5] (p29-30)}

1937年,国民政府成立建教合作委员会,由教育、经济、财政、交通、军政、内政、航空委员会等部会各派高级人员组成,以教育部主持其事。其任务为调查统计各项技术人才,拟定各级职校及专科学校设科计划与教学训练方案,筹拟教育与建设国防机构联络办法,以及统筹毕业生出路等等,“尚有相当结果”。^{[5] (p29-30)}次年12月,复于会内设置专门技术工作咨询处,办理调查统计、合格登记,及介绍工作三项事务。自1939年4月至11月底,调查统计非常时期专门人员7322人。是项人员,按规定,应声明愿担任有关抗战之工作,并向政府指定机关登记,政府依抗战需要作出安排。除上项人员外,该处复办理一般专门与技术人员登记,对于失业者助其就业,不满于现业者予以调剂。咨询处成立一年,共登记合格人员1128人,苏、鄂、川、皖、浙、湘、粤、晋、闽、鲁、赣、东北各省籍,甚至香港、澳门、新加坡、越南(时称安南)等地皆有参加。一年来委托介绍工作995起,由处自动介绍258起,登记人指定工作请求介绍者19起,总计1272起,落实774人。此种人员介绍工作,纯以各登记人之专长志愿及希望待遇等项为标准,毫无强制性。^[8]在地方,则由省教育厅会同相应省级行政产业机构,组成省建教合作委员会,协调本地区职业教育与经济建设部门之间的合作。为切实改善职校教学实习,造就社会所急需的优良技术人员,教育部还采取了以下诸项措施:

补助各省职业学校充实设备。战前,教育部就已呈准行政院,自1936年度起,每年就生产教育费项下指拨1/2以上补助公私立优良职业学校,用以扩充职校实习研究设备及提高专科教员薪水。同时规定,农工两科职校每年应占补助费总额80%至90%,商业及家事类每年占10%-20%。要求各省市教育厅局,就所属公私立职业学校,选择成绩优良而经费困难者一、二校,向部申请补助。1937年度补助费总额40万,经核准补助者53校,内工业(侧重机械科)45校,农业及其他科目8校。1938年度补助14万,经核准者为15校,工校仍居多数。^{[5] (p28)}1939年度补助33.9万元,计四川5.5万,西康2.5万,云南7万,陕西4.6万,广西3.9万,贵州5.5万,江西2.6万,宁夏2万,福建0.3万。^{[4] (p163)}

督促各省市职校完成基本训练并成立生产组织。1939年,教育部通令各省市,要求其在本年度内做好如下工作:充实所属公私立职校必要设备,对于学生实习作业,一律完成基本训练,并依环境需要,从事实际生产工作;责令已具基本设备之各科职校,一律成立同性质的生产组织,所需生产基金,公立学校由省市县核拨,私立学校,由校董会筹措,公家酌予补助或贷金,成

本以外盈余,提成奖励成绩优良学生。^{[4] (p163-164); [6] (p228)}次年5月,教育部又出台《协助职业学校生产资金暂行办法》:凡实习设备较有基础及办理尚佳之职业学校,经教育部考查,认为应速行生产并成立生产组织者,可得本项生产资金之协助,协助数额视其科别及实习设备情形而定。凡受教育部协款之职业学校,各省市应同时拨款协助,其数额不得少于部款,惟经费特别困难者可斟酌情形呈请变更。^{[1] (p653-654)}

(六) 各省市分区辅导职业学校

1939年,教育部制订各省市分区辅导职业学校办法大纲,责令各省根据省市内物产、交通、文化及已设拟设各科职业学校分布情形,划分职业学校区,各区由教育厅邀请省内公私立专科以上学校暨有关生产军需机关,共负辅导职业学校教学实习改进之责。具体辅导内容包括:编定教材选择教本,改进教学方法;拟定实习工作进度,指示实习方法;指导教员进修;借用教具教材及参考资料;供给师生试验及实习等。^{[4] (p162)}

其他值书的措施还有:合理规划中学、师范、职业三类中等学校设置比例;举办各种暑期职业教员讲习会,奖励职业学校职业科教员进修;津贴职校优良技术教员导工并设置技术奖助金;积极推进矿工农各业职工职业补习教育;发动全国农业职校员生切实调查各地农民经验等等。

二

在日军大举入侵、国土大片沦丧、职教事业遽遭重创的厄境之中,国民党政府各有关部门,并未惊慌失措,他们积极应对,勉力支撑。中国的职业教育非但没有因战事而荒厥,反而在数量和质量方面均获较大发展。

(一) 职校数量与办学规模显著提高

1936学年度,全国共有职业学校494所,学生56,822人,教职员8645人。受战事打击,1937学年度,全国职校跌至292所,学生降至31,592人,教职员降至4844人。1938学年度,职业学校和教职员数目继续下滑,惟学生数目较上年略有回升。但从1938年底开始,教育迅速进入恢复重建期。自1939学年起,各项指标稳步上升。到1945学年度,全国已有职校576所,较战前增加82所;学生总数102,030人,较战前增长45,208人,增幅近80%;教职员13,991人,增加5346人,增幅61.8%。战前,学生每校平均115人,教职员为17.5人。到1945学年时,学生每校平均涨至177人,教职员增到24.3人,办学规模明显地扩大了。^{[1] (p691-695)}

另外,参加短期职业培训的人数,笔者估计在5000人以上;参加经济部技工训练处主持之技工训练者3400余人。两者相加,技术人员养成数目十分可观。

(二) 人才层次大幅提升,专业结构更加合理

就中等职业教育而言,战前,有高级职校191所,初级258所,高初合设45所;学生高级21,153人,初级35,669人,高级比例为37.2%。而到了1945学年,全国高级职校增至229所,初级则降至201所,高初合设增至146所;学生高级48,194人,初级53,836人,高级比例上升到47.2%。^{[1] (p691,693)}

专科职业教育方面,战前,全国共有公私立专科学校30所,而到1945年,全国专科学校已增加到52所。专科及专修科学生由原来的4592人增加到13,449人,^{[1] (p778-779,783,787)}增速近两倍之多。抗战期间,另有

多所大学增设了机械电机工程师班。人才培养层次大幅提升。

专业构成方面,战前,全国有农职 161 校,学生 15,431;工职 128,学生 18,055;商职 69,学生 14,144;家事类 109,学生 5055;其他 27,学生 2749。^{[5](p49-50)}到 1946 学年度,全国农职为 173,学生 47,732;工职 157,学生 39,911;商职 121,学生 29,125;医事 124,学生 10,440;家事 28,学生 4119;其他 11,学生 1403;海事 13,学生 2310。农工商医各科增长迅速,尤其是医科,家事类别大幅下降,专业设置也较战前齐全,这些现象一方面折射出战时需求的变化,同时亦部分展现了国民政府职教改革之成效。专科职业教育方面,战前各省市专科学校,多属于艺术、体育两科,医、农、工各科较少。经国民政府竭力提倡,不足 10 年,医、农、工专科学校增加 1 倍。^{[3](p1035)}

(三) 职校分布趋向均衡,东西差距明显缩小

战前,各省职业学校,和普通中学、师范学校一样,几乎全部聚集于省会或交通便利之城市,在边远而偏僻的县份,甚至数县之间,可能没有一所学校,各地文教事业发展极端不均衡。但随着战事的展开,这种局面有了明显的改观:一则学校由集中于少数县市而趋于向各县均衡发展,一则由集中于少数城市而趋于向乡村疏散。造成这种变动的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敌人炮火的威胁,抗战发生后,沿海沿江各重要城市先后沦陷,原有学校或毁于战火,或移向后方偏僻县份和乡村,而新增学校,基于安全考虑,也必然会设在敌人不易到达之处;其次是最高当局分区设校方针政策的推行。无论客观环境使然,抑或主观上的不懈努力,最终结果是值得称道的。

至于东西部之间的差距,战前,我国职业教育以长江流域、华北及湖南各省较为发达,西南西北方面则极为落后。战事发生后,随着经济文化国防建设重心的转移和政府各项政策的推进,西南西北地区教育落后的面貌迅速改观。如陕西,1936 年度,全省中学、师范、职业三类中等学校总计 43 所(按常例推算,职校不会超过 1/3),而到 1945 年度,仅职业学校一项,就有省立 11 所,县立 7 所,私立 15 所,总计 33 所。^{[3](p1073)}甘肃,1938 年时,全省还只有职校 6 所,在校学生 706 人,到 1945 年,学校已增至 14 所,在校学生增至 2454 人。^{[3](p1075)}贵州,1934 年尚无一所职业学校,而到 1947 年度,仅省立职业学校就有 10 所。^{[3](p1064)}绝大部分为战时创办。再如广西,该省战前只有短期职业训练班,而无正式职业学校之设。直到 1938 年,省政府委托中华职业教育社筹设省立平乐初级实用职业学校,桂省始有正式职业学校。此后,逐年增设,到 1945 年,全省已有省立职校 8 所。此外,南宁、梧州、桂林、百色各地次第设立高级护士助产职业学校;苍梧、上林等县先后成立县立初级职业学校。^{[3](p1065)}职业教育素来落后的大西南大西北地区,数年间亦呈现出前所未有之繁荣景象。

总之,和抗战之前相比,中国的职业教育不仅在数量上有了较大发展,在质量方面亦有足资称道之处。如国民党政府所愿,其不仅为战时国防及大后方经济建设培养了大批实用型技术人才,为持久抗战作出了突出贡献,也为战后恢复重建工作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四) 历史启示

时隔半个多世纪,再次重温这段历史,笔者深切地感受到,其时的许多做法,对我们今后的职业教育,乃

至其他系列教育工作,都不失一定的借鉴意义。以笔者之见,最为突出者有以下两端:

政府高度重视。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一面不断健全完善职业教育的法律法规,确保职教工作有章可循,顺利开展,一面不断出台各项改革措施和方案,提高职业教育的质量和效益。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国家为职业教育提供了不小的经费支撑。或由中央斥资兴办地方不易办到之事,或由中央协款助办。即便是私立教育,也一体予以资助和奖励。在艰苦卓绝的战争环境中尚能如此,的确令人赞叹。教育,作为国家公共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确实需要政府承担起更多的责任,切实加大教育投入,尤其是老少边穷地区,让所有适龄青少年或者儿童,都能得到接受教育的机会和权利,并尽可能享有同等的教育资源。

产教紧密结合。抗战时期,为了纠正以往脱离实际的“正规化”职业教育的弊端,教育部出台多部法令,力促教育部门与生产建设机关加强合作。同时,成立实用职校顾问委员会、中央建教合作委员会、省建教合作委员会等专门机构,邀请各业界专家暨政府各部代表,共商职业学校教学、实习,与毕业生出路等大计。另一方面,又要求具备基本设备的各种职校一律成立生产组织。多方资料显示,这些生产组织并非单纯为学生提供实地练习之所,它还承载着为社会提供产品的任务。即是说,它要“协助经济建设、军需制造及国防农工业之发展”。^{[4](p163)}以上种种做法包蕴着职业教育同生产劳动和市场保持紧密联系的正确方向,符合现代复杂多变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

另一方面,战时的职业教育还加深了我们对提高中国职教身份问题的理解。如所周知,受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职业教育的地位远逊于普通教育,这一根深蒂固的思想严重阻碍了职业教育的正常发展。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三令五申,督促各省分区设校,并合理规划中学、师范、职业三类学校的设置比例,期能改变以往后者发展严重滞后的局面。同时,又对职校生实行公费待遇,就连私立学校也有三成的公费名额,欲以经济手段吸引众多青少年报考职校。历年推进之结果,职业学校的校班及学生数量确有显著增加,但与普通中学相比,其发展速度并不乐观。1936 学年度,全国有职业学校 494 所,学生 56,822 人,到 1945 学年度,全国职校 576 所,学生 102,030,增长幅度分别为 16.6% 和 79.6%。再看中学,1936 学年度,全国中学 1956 校,学生 482,522 人;到 1945 学年度,全国中学 3727,学生 1,262,199,增幅依序为 90.5% 和 161.6%。^{[1](p691-693)}职业学校的发展远不及普通中学。该组数据亦充分表明,抗战时期,新增中等学校大部分为中学,这与政府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看来,社会传统观念及青年心理仍多趋向中学,趋向于学术型的高等教育。历史昭示我们:仅凭行政和经济的手段,很难使职业教育摆脱困境。丹麦、芬兰、挪威、瑞典、德国等国的职业教育非常发达,参酌他们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笔者感到,切实提高职业教育质量,大力增强普通劳动者的权益保护,才是解决当前问题的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

- [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教育(一)[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 [2] 钟道赞. 抗战十年来中国的职业教育[J]. 中华教育界,复刊第一卷第一期.

(下转第 65 页)

之中。从宋词的韵律美上来说,两组译文都采用了忠实于原作韵律格式的方法,斟酌语音轻重,语调抑扬,节奏快慢,确保了文体上的同质性。另外将原作中的音乐符号成分,标点、停顿、换行、语序、连接词以及转折词都恰如其分地用英语表达,将词人的构思与所展现的乐调准确无误地再现给日语的读者。

[参考文献]

- [1] 赵一凡. 译. 西方的文学翻译[A]. 外国翻译理论评介文集[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3.
- [2] D. C. Lau, "Twenty Selected Lyrics," Renditions 11 - 12, 1979.
- [3] 孙耀煜. 中国古代文学原理[M].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6.
- [4] James R. Hightower "The Songwriter Liu Yung", part 2,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42, No. 1 (Jun. 1982)
- [5] Stephen Owen "Meaning the words", Voices of the Song Lyric i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 [6] 毛荣贵. 翻译美学[M].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5.

[责任编辑:王云江]

On translation aesthetics of song lyric ——Case study on "Ta suo xing" and "Ch'iu - yeh yüeh"

ZHANG Wen

(College of Art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Abstract: Based upo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Yan Shu's "Ta suo xing" and Liu Yong's "Ch'iu - yeh yüeh", this paper attempts to display Song lyric's particular sentimentality, observes different narrative points of view as well as appreciates the charm of translation aesthetics.

Key words: song lyric; translation aesthetics

(上接第60页)

- [3] 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 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M]. 商务印书馆, 1948.
- [4] 杜元载. 革命文献第58辑[M]. 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 1972.
- [5] 杜元载. 革命文献第57辑[M]. 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 1971.
- [6] 杜元载. 革命文献第61辑[M]. 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 1972.
- [7] 教部加紧训练中级技术人员概况[N]. 申报 1940 - 10 - 1 (8).
- [8] 一年来建教合作专技工作咨询实施概况[N]. 申报 1940 - 2 - 16(8); 1940 - 2 - 17(8).

[责任编辑:王云江]

Vocational education during Anti - Japanese War and its enlightenment to today's work

SUN Yu - qin

(Department of Marxism and Leninism,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071008, China)

Abstract: After outbreak of the Anti - Japanese War broke out, KMT government reformed with keen determination in the field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t increased state - run vocational schools, set up art institute, founded primary practical vocational schools, increased secondary technology subjects, held various short - term vocational training classes, promoted cooperation between construction and education sector, improved teaching practice, guided vocational schools by district, and so on. Chinese vocational education didn't collapse on account of the war, on the contrary, it gained marked development in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Key words: during Anti - Japanese War; vocational education; enlightenment